

香港華資財團



馮邦彥 著

力薄弱則
長此以往
近間有
同人等有
用穩固之
酌損益
諸君子
微專章列

論尙矣然欲殖產舍財未由大學所以謂有財此有用而金融
俄闕之設所由不能須臾緩也獨是組織1841善則1997者多能
之說是謂困毛由後之說是謂益人
場安得不困頓吾國又安得不匱乏
合者然遺神取貌已悖泉布之義矣
鉅資刺取良法組織一名實相符信
社會之習慣參以外國銀行之精神
勝券可操而吾國商業亦可期發展
策富強乎請共同規畫以底於成謹

銀行招股簡章

香港

華資

財團

1841—1997

馮
邦
彥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封面圖片：本世紀初香港最具規模的華資家族財團之一——永安公司創辦人合照。

封面襯底：1918年創辦的東亞銀行招股書，明確表示“有意為祖國策富強”的宗旨。

封底圖片：1988年有份參與投資新加坡新連城的香港華資財團首腦合照。

責任編輯 李 安

裝幀設計 洪清淇

書 名 香港華資財團 (1841—1997)
著 者 馮邦彥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97年9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8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 (140 × 210 mm) 592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418.7

©1997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香港華資和香港英資，長期以來均是香港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兩大資本勢力，彼此之間密切相關而又激烈角力，交織成一部近現代香港經濟的發展史。從這一意義上說，本書是《香港英資財團(1841-1996)》(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版)的姐妹篇。

對“香港華資”這一範疇，歷來存在頗為分歧的認識。在本書，筆者將其定義為：由華人控制及管理的、以香港為基地或經營重心的私人資本。具體而言，包括三層規範：

首先，香港華資是指由華人控制及管理的資本，以區別於英資、美資、日資及其他國際資本。至於華人的定義，則是指中國人，不論其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持有何種國籍護照，來自何處。從歷史上看，香港華資基本上是由來自中國內地、東南亞及美、澳等海外地區的華人資本，以及香港本地的華人資本融合而成長起來的。這裡，華資的概念首先具有民族性。

其次，香港華資是指以香港為基地或經營重心的華人資本，具有明確的地域性。一般而言，這些資本應以香港為集團總部所在地，其主要資產、業務和盈利來源集中在香港，以區別於以東南亞諸國等海外地區為基地而進軍香港的僑資。當然，這些僑資一旦將其經營重心轉移到香港，就逐步地融入香港華資之中。因此，香港華資是一個動態的概念。

再次，香港華資還有一個特定的規範，它是華人資本中的私人資本，以區別於以國家資本為後盾的中資。內地一些政府部門、國家企業以私人名義在香

HWT 5/12

港的投資，其性質仍非私人資本，故不屬香港華資的範疇。

本書就是以這一特定內涵為前提研究香港華資財團的，並試圖從歷史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香港華資財團的萌芽、形成、崛起以至稱雄的整個歷史進程作一客觀、平實的概述和剖析。全書共分七章：第一、二章“行商和買辦的崛起”和“家族財團嶄露頭角”，概述了香港開埠首一百年間華資財團的萌芽、形成、發展及其歷史背景。第三、四章“新興財閥勢力抬頭”和“崛起中的挫敗”，敘述了隨着香港的工業化和經濟起飛，新興華資財閥在工業、航運、地產及其他各行業相繼崛起，整體勢力在香港經濟中迅速提升，以及局部的挫敗對華資財團長遠發展的影響。第五章“稱雄香江”，重點描述了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後期新興華資財閥打破英資的長期壟斷、稱雄香港的歷程，剖析了這種急遽轉變背後所深藏的政治、經濟等種種客觀及主觀原因。第六章“過渡時期投資策略”，考察了進入過渡時期以後香港華資大財團的主要投資策略及其轉變，這種轉變的時代背景及其對香港經濟的影響。第七章“歷史的回顧與前瞻”，是全書的總結，主要分析了華資及華資財團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作用，華資財團的經營特點及其面對的挑戰，以及九七回歸所帶來的歷史契機。

本書寫作期間，香港的九七回歸已日漸迫近，“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一系列方針政策正逐步付諸實踐，以董建華先生為首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屆政府班子已大體組成，平穩過渡已成定局，經濟穩定發展，香港正在全球注目之中邁進一個歷史新紀元。九七後，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將發生質的變化，從中英兩國之間的外部關係轉變為一個國家內部兩種不同經濟制度之間的特殊關係，橫亘在兩地間的主要政治障礙將隨之消除，香港與內地之間多層次、多領域的經濟合作更形廣闊，香港作為國際資本進軍中國內地的橋樑和跳板的戰略地位亦大大提高。這種歷史性的轉變，無疑將為香港的華資財團帶來空前的發展機遇和空間。因此，現在正是恰當時機對香港

華資財團的歷史作一個總結和簡明的前瞻，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逾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經濟所經歷的深刻變化，各種資本與財團勢力的激烈競爭和角力，並藉此透視香港華資財團在歷史新時期的發展路向。倘若本書能對讀者有所裨益，筆者將深感欣慰。

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首先要深深感謝為本書內容進行訂正或提供資料圖片的各公司創辦人、其後人及資深員工，他們的戮力相助，一絲不苟的精神，使本書增添了更大的歷史價值，以不負創業者走過的艱辛。現列諸位芳名如下(按該公司在書中出現先後為序)：李寶椿置業執行董事李兆增先生，周煥年公子周湛樵先生，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先生，馮秉芬企業主席馮秉芬爵士，許愛周先生家族成員許晉奎、許晉乾、許晉義先生，王統元先生千金王培蓀小姐，利豐集團董事長馮國經博士，梁銻琚先生千金梁潔華小姐，大昌貿易行資深員工梁智斌先生，余仁生副主席余經堯先生，白花油國際執行董事顏福偉先生，前南海紡織主席唐驥千先生，南豐紡織主席陳廷驊先生，南聯實業名譽董事長安子介先生，南聯實業常務董事唐翔千先生，開達實業董事長丁午壽先生，麗新集團主席林百欣先生，前東方海外國際主席兼行政總裁董建華先生，華光航業董事總經理趙世光先生，萬邦集團董事長曹文錦先生，霍英東集團主席霍英東先生，廖創興銀行董事長廖烈文先生，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先生，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先生，新世界發展主席鄭裕彤先生，恒基兆業主席李兆基先生，信德集團行政主席何鴻燊先生，柏寧酒店集團主席陳澤富先生，鷹君集團主席羅鷹石先生，華人置業主席劉鑾雄先生，嘉里集團董事長郭鶴年先生，卜蜂國際副總裁陳定國博士及力寶集團主席李文正先生。

同時，南北行公所、東華醫院、香港中華總商會、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東亞銀行、恒生銀行、中建集團、利豐集團、廣生堂、白花油國際、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信德集團、富麗華酒店、新鴻基地產、華人置業、國浩集團

及力寶集團之公關部或有關負責人，亦協助核實資料及提供圖片，他們的專業精神，使人印象深刻。

此外，為本書提供圖片的尚有冼玉儀博士、李培德博士、鄭寶鴻先生、巫羽階先生、香港大學香港歷史研究室、《資本》雜誌、《大公報》資料室、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市政局、新華出版社、約翰·溫納出版社、中山大學出版社、Graham Brash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明報出版社及名流出版社。

最後，筆者深切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趙斌先生及本書責任編輯，沒有他們的全力支持、熱誠幫助和辛勤努力，本書實難以順利完成，並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出版。此外，筆者還要特別感謝香港經濟學社主席胡國亨先生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培德博士，再度為拙作撰寫推介，對其厚義隆情，筆者銘感於心。

由於筆者水平所限，其中定有不少疵誤和錯漏之處，懇請識者批評、指正。

馮邦彥謹識

1997年6月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行商和買辦的崛起	1
	一、香港開埠和早期華商的發展	2
	二、行商：南北行和金山莊	15
	三、依附英資的華人買辦	29
	四、華商在香港政壇的冒起	38
第二章	家族財團嶄露頭角	49
	一、華資家族財團形成的背景	50
	二、百貨宗師：先施、永安	57
	三、銀行翹楚：東亞、恒生	77
	四、從貿易、航運到地產投資	93
	五、華資大商行：利豐、大昌	107
	六、華資在化妝、醫藥業的發展	122
第三章	新興財閥勢力抬頭	137
	一、製造業：群雄並起	138
	二、蜚聲國際的航運四鉅子	165
	三、名震香江的“地產五虎將”	181
	四、從影視娛樂及酒店業崛起的大亨	211
	五、新興華資財閥勢力抬頭	230

第四章	崛起中的挫敗	239
	一、銀行業：家族銀行的惡夢	240
	二、地產業：大衰退中的潰敗	253
	三、航運業：大蕭條中的債務重組	267
	四、挫敗對華資發展進程的影響	276
第五章	稱雄香江	283
	一、長實：香港首席家族財閥	284
	二、會德豐：船王的陸上商業王國	300
	三、地產業巨擘：新地、恒地、新世界、恒隆	315
	四、新一代財閥：“股壇狙擊手”	344
	五、稱雄香江的“過江龍”	364
	六、新興華資財閥崛起的原因	385
第六章	過渡時期投資策略	395
	一、“立足香港，在這裡發展”	396
	二、多元化：以電訊和基建為重點	418
	三、國際化：向海外拓展	440
	四、揮師北上進軍中國大陸	455
	五、投資策略轉變的背景和影響	476
第七章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	487
	一、華資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	488
	二、華資家族財團的經營特點和挑戰	511
	三、“九七”回歸的歷史契機	525

附錄

一、香港華資財團大事記	543
二、1996年香港華人家族財富排名榜	563
三、1996年國際華商500——香港公司排名錄	568
照片出處	575
作者簡介	581

第一章

行商和買辦的崛起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導致了英國對香港的侵佔和近代香港開埠。隨着英資洋行、銀行、輪船公司的湧入，香港傳統的自然經濟日趨瓦解，西方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商業社會迅速形成。到十九世紀末，香港從昔日的漁農社會演變成遠東轉口貿易的商埠，這種急遽的經濟轉變，為香港近現代華商勢力的崛起，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背景。

香港早期的華商，其主力是以南北行、金山莊為代表的行商和依附英資洋行、銀行、大公司的華人買辦。這兩股勢力的崛起，形成了香港華資的第一次發展浪潮，使華商成為香港經濟中一股具影響力的重要經濟力量，並為香港最終確立其作為遠東貿易轉口港的地位，奠下了一塊基石。不過，這一時期，香港華商就整體而言，基本上仍是作為英資財團的附屬力量而存在、發展的，或是在其夾縫中萌芽、成長的，尚未具備獨立性。這是香港華資家族財團的萌芽時期。

一·香港開埠和早期華商的發展

香港早期華商勢力的冒起，基本上是和香港開埠、逐步演變為遠東轉口貿易商埠的整個歷程同步展開，並互為動力的。

英國侵佔香港的經過

1840年6月，英國政府憑藉當時英國如日中天的國勢，悍然向日漸腐敗無能的中國清皇朝發動鴉片戰爭，戰爭的結果之一是英國侵佔香港及近代香港開埠。

十九世紀上半葉，東印度公司及以怡和、寶順、旗昌等為首的英、美洋行對中國進行的日益猖獗、規模浩大的鴉片貿易和鴉片走私，引發了中國嚴重的社會危機，大量白銀的外流導致銀貴錢賤。這種局面不但嚴重影響了中國人民的生計，而且還動搖了清皇朝的統治。在全國要求禁煙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清政府終於下決心嚴禁鴉片。1838年底，道光皇帝派遣力主嚴禁的“抵抗派”領袖、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查禁鴉片。翌年6月，林則徐在虎門主持銷煙，制止了鴉片貿易持續驚人增長的勢頭。然而，以怡和、寶順洋行為首的英商，不甘就此放棄其所攫取的鴉片貿易的龐大利益，遂積極鼓動英國發動侵略戰爭。

1840年6月，英國政府派遣海軍少將懿律（G. Elliot）和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 Elliot）為正副全權代表，率領一支由48艘船艦組成，包括16艘軍艦和4,000陸海士兵的東方遠征軍前往中國作戰。懿律率軍封鎖廣東珠江口後，即揮師北犯，直達海河口，威脅京津重鎮。面對嚴峻的軍事形勢，清政府大為恐慌，遂將林則徐革職，改派“投降派”、直隸總督琦善為欽差大臣，到廣州與英軍交涉。

1841年1月20日，義律發布了一項“給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聲稱已與琦善簽訂“穿鼻條約”，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並賠款600萬元。惟此條約未經清政府同意，琦善上奏時不過懇准“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並無割讓香港之意。英國政府對這項“草約”亦極為不滿，認為義律從中國攫取的利益太少，決定推翻，解除義律在華一切職務，改派侵略印度有功的砵甸乍（又稱璞鼎查，H. Pottinger）為侵華全權代表。

砵甸乍到中國後，即率英軍艦隊大舉進攻，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先後攻陷廈門、定海、寧波、上海，並進攻長江，直達南京江面。1842年8月29日，在英國強大軍事壓力下，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包括賠款2,100萬兩白銀；開放上海、寧波、廈門、福州和廣州五口通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條款，是割讓香港島予英國，規定中國“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王位者，常遠據守主管，任便立法治理”。

不過，英國政府並不滿足於只佔領香港島。1856年10月，英國藉口所謂“亞羅號”事件⁽¹⁾，組成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1860年10月24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將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割讓給英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西方列強在中國掀起劃分勢力範圍熱潮，1898年6月9

日，英國政府再迫令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島及附近200多個島嶼，即後來被稱為“新界”（New Territories）的地區，租借期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屆滿。

就這樣，在從事鴉片貿易的英資洋行的竭力鼓動下，英國政府用堅船利炮強行侵佔香港，揭開了近代香港逾150年歷史的序幕。

近代香港的開埠

英國對香港的侵佔其實早有預謀。1834年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W.J. Napier）來華時，就已看出香港的重要戰略和商業價值，提出了佔領香港的建議。怡和洋行創辦人渣甸（W. Jardine）也表示：如果認為“我們必須佔有一個島嶼或是佔有一個臨近廣州的海港”的話，那麼香港最為適宜，因為“香港擁有非常安全廣闊的停泊港，給水充足，並且易於防守”。⁽²⁾事實上，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期間，原停泊在伶仃洋面的大部分鴉片躉船均已轉移到香港區域海面。佔領香港，無疑為英國在中國的擴張以及英商對華鴉片貿易奪得了一個最有利的據點。

1841年1月25日，就在義律單方面宣布已與清政府簽訂“穿鼻條約”的數天後，義律率領的東方遠征軍就迫不及待地強行侵佔香港島，翌日由英國駐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Commodore Bremer）率部舉行隆重升旗儀式。登陸的地點就是香港島上環水坑口街附近一個高約200呎的海角，後稱“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同年6月7日，義律代表香港殖民當局宣布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允許船隻自由出入，香港正式開埠。

香港作為自由港，確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香港地處廣東珠江口東側，瀕臨南中國海和西太平洋，是中國南方的重要門戶。它位居亞洲太平洋的要

衝，處在日本和東南亞諸國的航運要道上。最具戰略和商業價值的是，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環抱的維多利亞海港，港闊水深，海港面積達60平方公里，最闊處近10公里，最窄處1.6公里，水深9米至16米，港內可同時停泊150艘遠洋輪船，吃水12米的遠洋巨輪可自由進出。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內風平浪靜，是與舊金山、里約熱內盧齊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這種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它在開埠後的100多年間，從對華鴉片走私的基地發展為遠東轉口貿易的繁榮商埠。

1841年英國侵佔香港之初，香港主要是一個海島型的漁農社會，據1841年5月15日香港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當時香港島的人口僅5,450人，散居於赤柱、筲箕灣、香港村等約20個村落，主要是漁民、佃農、石匠、市集商販和少量來自九龍半島的勞工。(3) 漁民主要居住在香港村、群大路、大浪等漁村，以沿海捕魚為生；佃農則向錦田鄧族、南頭黃族、上水廖族租種位於港島北岸黃泥涌、掃桿埔及南部赤柱、深水灣、淺水灣的農地；石匠聚集在港島的鯪魚涌、阿公岩、石塘咀等地採石，供當地漁農修築房屋、興建神廟。其時，九龍半島西岸的油麻地、何文田、大角咀及東岸的紅磡、大口環等地亦散居着為數約5,000的漁農石匠，而後來被稱作“新界”的地區則聚居着以錦田鄧族、河上鄉侯族、粉嶺彭族、上水廖族及新田文族五大姓為主的居民，以農耕為業。這五大族皆宋、元、明間遷入香港。(4) 很明顯，開埠之初，香港仍處於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之中，漁民、佃農、石匠和市集商販構成社會的主體。

不過，這種平靜的社會結構很快就被打破。隨着侵佔香港英軍的登陸，以怡和洋行為首的一批與鴉片走私密切相關的英資洋行相繼從廣州、澳門進入香港，他們搶先在港島北岸從銅鑼灣到中環地段建立據點。原先停泊在伶仃洋面的鴉片躉船也紛紛駛進維多利亞海港。1841年6月14日，義律代表香港殖民當局首次拍賣沿海土地，他在港島北岸劃出40幅地段公開拍賣，每幅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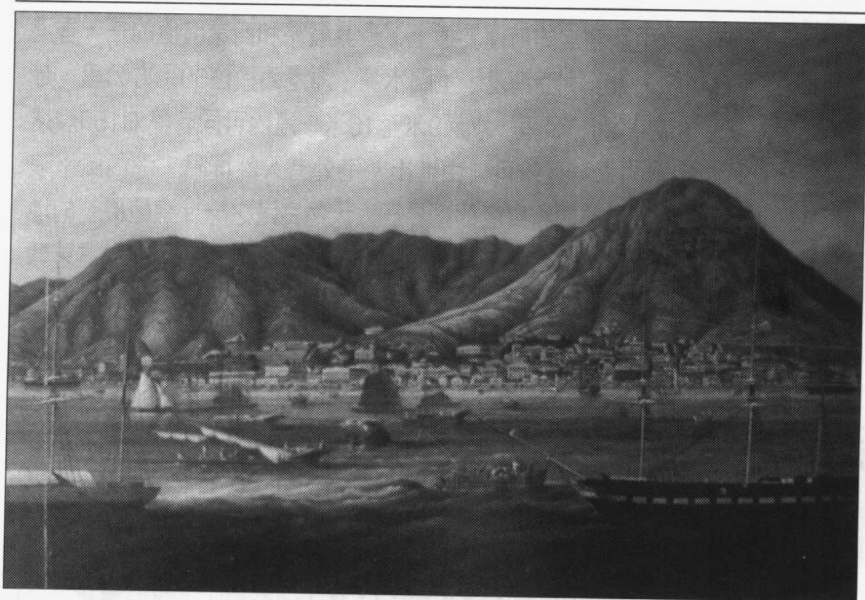


圖1.1 維多利亞城遠眺。1850年代香港已略具遠東貿易轉口港雛形，各項建設亦告展開。

約有100呎海岸，底價10英鎊，結果共售出33幅土地，最低價為20英鎊，最高價265英鎊，平均每幅地段價值71英鎊。中標者包括25家洋行或私商，大部分是英資洋行，其中，怡和洋行投得銅鑼灣東角，林賽洋行投得灣仔春園，寶順洋行則投得中環地段。

1841年8月，砵甸乍抵港，接替義律主持香港的殖民開發，1843年並出任首任香港總督。砵甸乍到香港後即着手制定香港的城市發展規劃，他將港島劃分為3個區域，包括海域區、城市區和郊區：規定離海岸200呎範圍之內的區域為海域區，現今中環沿海地區、跑馬地、赤柱及香港仔等處為城市區，而其他地區則為郊區。⁽⁵⁾ 後來，中環沿海地區發展成維多利亞城。當時，怡和洋行在銅鑼灣東角經營，孟加拉志願軍則駐紮在西營盤，1842年建築的皇后大道將東西兩個據點連接起來。皇后大道至海面的沿海地區是洋行、貨倉的聚集地，商店則集中在燈籠洲，即後來的銅鑼灣東角和灣仔春園一帶，後來向西發展，形成皇后大道的繁華商業區。

1843年底，即中英《南京條約》批文交換後不久，砵甸乍為維護西方殖民者利益，將中環維多利亞城中心劃為洋人專屬居住區和商業區，東西兩側為華人區，跑馬地一帶則供華洋上流社會打獵、郊遊之用。自此，域多利皇后街與花園道之間包括威靈頓街、雲咸街、雪廠街、畢打街在內的中環地區，逐漸發展為洋人居住區和洋行、銀行的集中地，成為香港繁榮的核心商業區。

早期華人的經濟活動

隨着香港資本主義式的現代商業社會的形成，華人的經濟開始發展。最早湧入香港的是廣東沿海的水上艇戶，俗稱蛋民。他們駕駛着小艇進入香港的港灣，向停泊在維多利亞海港的洋船提供服務，將洋船上的貨物運返倉庫，或將岸上的補給送交洋船。由於生意不俗，這批艇戶在短短數月間人數便急增